

巴伐利亚艺术学院文学大奖

柏林艺术奖

毕希纳奖

一无所有的梦想家，拥有人生的三个梦想

女人，房子， 一部小说

Eine Frau, eine Wohnung, ein Roman

[德国] 威廉·格纳齐诺 | 著

刘海宁 | 译

被中学开除后，
我必须加快脚步成长。
也许在这粗暴的过程中，
我失去了大部分的青春……

《一把雨伞给这天用》

作者自传性小说



译林出版社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

女人
房子
一部小说

Eine Frau, eine Wohnung, ein Roman

[德国] 威廉·格纳齐诺 | 著
刘海宁 | 译

译林出版社

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女人,房子,一部小说/(德)格纳齐诺著;刘海宁译.—南京:译林出版社,2009.1

(21世纪外国文学大奖丛书)

ISBN 978-7-5447-0589-9

I. 女… II. ①格… ②刘… III. 长篇小说-德国-现代
IV. 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8)第063573号

Eine Frau, eine Wohnung, ein Roman

Copyright © 2003 Carl Hanser Verlag München Wien

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Hercules Business & Culture

Development GmbH, Germany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08 by Yilin Press

All Rights Reserved.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10-2006-339号

- 书 名 女人,房子,一部小说
作 者 [德国]威廉·格纳齐诺
译 者 刘海宁
责任编辑 陆志宙
特约编辑 王延庆
原文出版 Carl Hanser Verlag, 2003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译林出版社(南京湖南路47号 210009)
电子信箱 yilin@yilin.com
网 址 <http://www.yilin.com>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印 刷 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80×1230毫米 1/32
印 张 4.5
插 页 2
字 数 83千
版 次 2009年1月第1版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47-0589-9
定 价 15.00元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Eine Frau, eine Wohnung, ein Roman

女人，房子，一部小说

—

17岁那年,原本没什么特别的打算,不料想却懵头懵脑地撞进了双重生活之中。不久前刚被中学开除,于是父母一再催促我,要我学一门手艺。我那时对究竟应当操持什么职业,心里没有一点儿谱。没有主意,但是又想让惊慌失措的父母放下心来。其实我是不想当什么学徒的,但还是父母的压力占了上风,于是便跟着妈妈到形形色色的人事部门去应聘。每次应聘面试的谈话,气氛都很压抑,让人难受。跟在妈妈后面走进负责人的办公室,我总是紧张得要命,根本顾不上给人留下什么好印象,只知道一个劲儿地听,东瞧瞧,西望望。我不喜欢那些负责人,他们也不喜欢我。这一天早晨的面试尤其糟糕。招人单位是一家大型园艺公司。我和妈妈坐在公司经理的对面。他掂量着我的肄业证书,丝毫不掩饰内心的鄙夷。园艺工虽然不需要什么专业,但是普通科成绩起码也要高过平均水平吧。说这话的时候,他的目光紧紧盯着我。我紧张得说不出话。是妈妈替我回答的。她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,说明为什么我的成绩不好。那个外科医生费迪南

德·绍尔布鲁赫^①当学生的时候,成绩不也很差吗,可是他后来不是照样在全世界出了名?听了这一番话,那个经理和我都傻了,他盯着她看,我也盯着她看。她怎么想得起来,把我的命运同费迪南德·绍尔布鲁赫相提并论?我是什么人?一个可怜的平庸的小中学生。那个经理好像倒是很想听听我说,看看我究竟会不会说话,究竟能不能说出连贯的话。但是我僵住了,甚至连嘴巴都张不开了。我的眼睛虽然在盯着他的脸,但是目光却绕过去,落在外面的景色上。他的身后是一扇很大的窗户,透过窗户可以看见熙熙攘攘的街道。一个男人正在往广告栏上贴一张大幅彩色广告,内容是一种全新上市的半苦半涩的巧克力。看了不到半分钟,我便沉浸在半苦半涩这个词中。我心里很清楚,自己眼下的处境就是半苦半涩。没想到竟然是一幅广告让我明白了自己的处境。对这个事先没有料到的提示,心中油然升起了一种感激之情。我很想把这个词写下来,可是这会儿不行,那就用脑子记下来吧。15岁以后,我差不多天天和文学打交道,读读写写,写写读读,写点随笔,弄点短篇,然后不加选择地给报刊杂志的编辑部投稿。我投稿的报刊杂志五花八门,有一本叫《卢库鲁斯》的周刊,这是一种促销杂志,摆放在我们买肉的肉店,供顾客自取;还有慕尼黑的《西木》,这是一种讽刺杂志,曾有过辉煌过去,不过我当时对它的历史一无所知。又过了大约两分钟,在这场半苦半涩的求职面谈还没有变得彻底苦涩之前,经理示意谈话结束,我们该走了。母亲要回我的学历证明,塞进包里。结果很清楚,我不需要当什么园艺工人,也并不为

① 费迪南德·绍尔布鲁赫(1875—1951):德国著名外科医生。

此难过。倒是母亲让我愧疚,毕竟是我让她放不下心来。在回家的电车上,心情一直很压抑。我多么希望母亲不会因此而责怪我。母亲果真默默地一句话也没说。至少就因为这个,我也应当向她说一声谢谢。但是即便在这个时候,我的嘴仍然紧紧地闭着,怎么也张不开。外面,一个年轻人把烟屁股弹到我们的电车上。你说我傻不傻,竟然对这件事忍不住笑了一下。母亲的目光立刻便甩了过来。她弄不明白,经历了这么一天的失意,自己的儿子怎么还能笑出来,虽然只是短短的一笑,但毕竟也是笑呀。其实我自己也没弄明白。恼怒之下,母亲有意让自己的目光异于往常,然而目光并没有落在我的身上,而是从我的身边滑过。要说我不明白自己刚才为什么发笑的话,其实我对母亲那种双重含义的眼神(也就是向着一样东西,却又不看那样东西)就更弄明白了。

家里,令人舒畅的意外惊喜正在等着我。两本杂志将我的两篇短文变成了白纸黑字,而且还给我寄来了样本。一个杂志是动物保护方面的画报,另一个则是药剂师协会的信息简报。我一头钻进厨房,读起自己的文章来,心中一阵阵欣喜。母亲则缩回到自己的卧室。我看见自己的文章刊登出来,并不怎么惊讶。才17岁,就可以称自己是作家了。不过我当时并没有胆量这么做。毫无疑问,我迟早要做的什么学徒肯定只是权宜之计。我最终是要搞写作的,而且是当成主业来干,说声开始就会开始的。不过究竟该怎么来从事这个职业,我心里还没有底。这也就是让我担忧的原因吧。我把两本样书收好,然后打开其他几封信。都是退稿的信。我把退回的稿子都看了一遍,然后探

寻投稿被打退票的原因。我把稿件中看上去还比较像样的文章挑出来,放进新的信封里,再写上其他杂志编辑部的地址。我侧耳倾听,房间里非常寂静,没有一点动静。求职受挫后独自一人在厨房里待那么长时间,这样不好。被学校开除已经过去三个星期了。但愿明年春天能找到一家单位做学徒。如果那个时候开始工作,那么我现在还有几个月的时间可自由支配,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来写作,思考,四处走走。母亲待在卧室里没有出来。她已经有很长时间不谈自己的事了。记得我14岁的时候,曾经怂恿她离婚。我当时想象的是,母亲会牵着我的手,母子俩可以开始一个全新的生活。但是母亲没有力量逃避,相反,她变得一年比一年沉默,一年比一年软弱。每次我和她坐在桌边,用鼓励的眼神看着她时,她总是无动于衷。此时我看着没有贴邮票的信封,让人欢喜的寂寞和让人愁闷的寂寞交织在一起。房间中越是寂静,隐藏在一日辛酸背后的那种对人生辛酸的揣测就越发厚重。不行,我忍受不了。于是我拿起信封,走出了家。

邮局里这会儿空荡荡的,让人舒坦。贴邮票的时候,我发现最左面的那个窗口旁有一束粉红色的玫瑰,显然是哪个人忘在那儿的。玫瑰的外面裹着一层高档的包装纸。没人去过问是谁丢了玫瑰。我想到了谷德伦,待会儿我正好要去办公室接她。如果能给她捧上一束玫瑰,她不高兴才怪呢。于是我走到左面的窗口,又买了十张特种邮票。我的稿件肯定会不停地寄下去。离开窗口时,我伸手拿过玫瑰。差不多要走到转门了,我听见背后响起了说话声。是邮局的人。他在喊话的时候甚至站了起来。那花是您的吗?他的声音穿过邮局的大厅。

不,不是我的。我返身走到窗口。我以为是谁忘记了,噢,我的意思是说谁丢了,谁落在那儿了。我要是不拿走,兴许就被扔掉了。哈!那邮局的人说,您不能随便把花拿走!丢花的人过一会儿肯定会来的。他不容分说,从我手中拿过花去。也可以说是我把花从柜台上递给他的吧。我没有停下来看那人摇着的头,而是立即转身,三步并做两步出了邮局。

一天中两次遭受打击,当然第二次并不太严重。其实不论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打击,我都没有力量招架。我默默地走着,漫无目标,随便往停在路边的汽车里看,看后座上散放着的東西。过了一会儿,我历数起看见的东西。杂志,行车图,购物袋,皮帽,橙子,毛毯,手套,奶嘴,烟头。很有意思,数着数着,那种命运无情的感觉竟然慢慢消失了。走过了大约三条街,我在街边停靠的汽车之间找了个地方坐下,我无声无息地又数了大约两百样东西。这时情绪又高起来了。两年前的也是在这里,一次闲逛的时候,曾经找过什么文学家咖啡馆。看书的时候,见书里经常说作家喜欢聚在咖啡馆,还有作家喜欢在咖啡馆写作什么的。但是我的那次寻找一点收获都没有。我们这座城市,没有作家,更没有文学家咖啡馆。那次虽然没有收获,但是普通咖啡馆倒是认识了不少,其中有一个叫希尔德咖啡馆。现在我又一次走进这家咖啡馆。里面空间很大,但是光线昏暗,地上是深咖啡色的地毯,顶上是低垂的球形吊灯。希尔德咖啡馆是战争幸存者(它的大部分客人是战争幸存者)。空气中混杂着滴滴着的牛奶、可可粉、木头和剩面包的味道。偌大的咖啡馆只有一个服务员,还是一个上了年纪的,而且

浓妆艳抹。尼龙连裤袜外面还套了一双黑色羊毛短袜,鞋子是金丝编的。下身齐腰部绷着一件紧身的裙子,上身是一件长长的、同样非常紧身的毛衣。她时不时走到柜台后面,给自己的眼影补妆。我坐的地方在咖啡馆的深处,可以观察到柜台和门口的一举一动。此外我旁边就是咖啡馆的所谓的阅读角。我漫无目的地翻阅以前没有见过的杂志,为投稿物色目标。如果发现一个有希望的,便记下编辑部的地址。柜台上有一个可以旋转的圆形玻璃小冰柜,里面分成三层,放有四只切成小块的蛋糕。两支微型的霓虹灯管跟着冰柜一块转动,把蛋糕晕染成和火车站一模一样的颜色。那位女服务员要是没什么事了,便会站在冰柜旁边,目不转睛地盯着不停转动的蛋糕。我的目光也时不时地投向那边,自己也不清楚为什么会让这个场景弄得如此迷恋。一位妇女带着一个孩子走进咖啡馆,在离我不远的地方找了一个座位。她手上拎着一个购物袋,有两条鱼从袋口露了出来。是鲱鱼。鱼是用报纸包的。但是那女人显然没有发现报纸滑到了边上,于是那两条被熏制得金黄的鲱鱼便在她的桌下闪闪发光。那孩子对她说:你是天底下最好的妈妈。女人很感动,眼光朝我这边看了过来。我给她一个示意,让她知道我听到了孩子说的话,而且能体会到她的感动。仅仅过了不到半分钟的时间,我就产生了写作的欲望,于是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,把眼前发生的记录下来。落笔从母亲和孩子身上开始。孩子对母亲说:你是天底下最好的妈妈。女人很感动,眼光朝我这边看了过来。听那孩子的口气,我接着写道,好像他已经有经验,经历了很多母亲,只有这个母亲从对许多母亲的考试中脱颖而出,是母亲中

的佼佼者。忽然,我对自己的文章有了一种异样的感觉。对这个孩子说三道四,连我自己都不高兴。难道说我记录下这么一段小小的场景,就是为了指责一个五岁的孩子吗?于是在接下来的写作中,每写一句话,我都要先设问一下:这句话是美呢,还是真诚呢;是不是只是美而不真诚呢;是不是因为智慧而显得忧伤呢;是不是既美又忧伤,但是却并不真实呢;还是只是真实的,但是却并不美呢;是不是仅仅印象深刻,但是却既不美又不真实呢;是不是只是有趣,但是既不印象深刻,也不真实,更谈不上美呢?很快,我结束了在咖啡馆的写作。我略有些疲倦地环顾了一下四周。观察着,观察着,我渐渐喜欢上了咖啡馆的各个细节(咖啡色地毯,黄色球形吊灯,旋转着的蛋糕,黑色羊毛袜,金光闪闪的熏鱼头)。从这种奇怪的组合中发散出一种奇妙的祥和,但是一时半会儿,我却无法用寥寥数语把这种气氛再现出来。

四个小时后,我在工业区的加油站等谷德伦下班。她比我大三岁,在一家工程设计公司当秘书。她的父亲战后一直没有音讯。她和母亲相依为命,住房很小,而且还是一半在地上一半在地下。我们俩认识的时间并不长,但是我们已经共有了一本存折。我们每人每月往里存 15 马克。谷德伦的母亲对此很是赞赏。我们俩还没有一起睡过觉,但是我们已经一致决定要生两个孩子,一个儿子一个女儿。在睡觉的问题上我们不愿意冒险。三个月前,谷德伦的姐姐卡琳结婚了,这是一次不得已而为之的婚礼。“挺着肚子结婚”(这是谷德伦的说法),这种事情我们是不会干的。对将来在哪个家具店买家具,我们也达成了共识,对此我们并不觉得有什么可奇怪的。不过眼下首先要做

的事情,谷德伦一再对我这么说,是我应当当学徒,而且越快越好。公司的门开了。谷德伦走了出来。我看着她朝我走来,看上去有点不自然。她的头发是深褐色的,身材小巧。还没走到我身边,她便问我今天都干了什么。我没有告诉她我在希尔德咖啡馆待了两个小时,我不想给人那种印象,好像我在游手好闲地四处乱逛,而是接下去编造我那没头没脑的长篇大论。今天下午的长篇大论的引子用的是托马斯·沃尔夫^①存放长篇小说《时代和潮流》手稿的大木箱子。我有意把话题扯到细节上去。把箱子中不着边际的手稿整理成一部能够阅读的长篇小说,这要他的编辑马克斯韦尔·艾瓦特·佩金斯付出多少辛劳呀。谈完托马斯·沃尔夫,我又把话题转到库尔特·图霍尔斯基^②身上,大谈他的四个笔名和他在瑞典的自杀。既然谈到瑞典,那离挪威诗人克努特·汉姆生^③就不远了,我谈到了他在克里斯蒂安尼亚忍饥挨饿的生活,他后来逃到了芝加哥,食不果腹的生活才告一段落。最后提到的是卡夫卡。我大谈他的家乡布拉格,其实我对这座城市的了解也都是从书上看来的。不过我知道得越少,谈起来就越起劲儿。看我谈论卡夫卡的样子,不知情的人会以为我和他本人认识,而且每天都能了解到他生活中的一些新情况。其实这么说也还是有点道理的。最近一段时间,凡是能买到的有关卡夫卡的东西,我都照读不误。每了解到一点新的东西,我都立即传达给谷德伦。有的时候,我边走

① 托马斯·沃尔夫(1900—1938):美国作家。

② 库尔特·图霍尔斯基(1890—1935):德国作家,政论家。

③ 克努特·汉姆生(1859—1952):挪威作家,192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。

路,边看她,边冲着她笑。说是看,其实有点监视的味道,是想看看,她是在认真听我说呢,还是我让她感到无聊了。快到半地上半地下的家门口时,我才结束掉今天的长篇报告。我拉着谷德伦走进她家的走廊,亲她的时候有一种冲动。我们觉得这种冲动是爱情的象征,也是我们未来的象征。其实我本人的感觉是,我虽然是在亲谷德伦,但实际上我是越过了谷德伦,在暗暗地向卡夫卡表示感谢,是他使我的生命重新焕发了活力。

刚刚过了一个星期,母亲又把我带到了一个又一个公司的人事部门。星期二是一家糖果店,星期三是一家轮胎厂,星期四是一家啤酒作坊。显然,我干什么,什么公司聘用我,这些都无所谓了。圣诞节一天天逼近,我的学徒岗位还是没有一点着落。那个时候我还喜欢画画,因此母亲又把我带到了几家图片社,还有几家小广告部。她以为在这种地方工作,就能把我培养成艺术家。想到她的天真,我至今都非常感动。母亲虽然几乎一直都在忙着应付自己的坎坷人生,但是我仍然能感受到她内心中对我的真情。可惜在图片社和广告部我也没有给人留下什么好印象。倒是有一家叫西格努的广告公司差点就聘用我了。公司经理竟然对我的绘画有好感,这让我感到很意外。更让我感意外的是,我竟然打算和他探讨探讨,如果把我的几幅引起他注意的画作当做广告小样,都有哪些用途。但是就在这时,这位经理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。在看我的作品时,他打开一瓶可可饮料喝了几口,然后把剩下的半瓶放在写字台上。看着眼前喝剩的半瓶饮料,看见那种咖啡色的黏黏的浓稠液体顺着瓶子的内壁慢慢往下流淌,顿时

一阵恶心涌上我的喉头。我克制自己不去看那个瓶子,但是做不到,目光反而紧紧盯着它,看着一滴一滴的可可汇聚成细流,然后凝结。经理接下来的问题我一个都没听见。被这么一个意外情况打断,我在这家公司的求职自然也就没有了任何结果。但是在回家的路上,我和母亲的对话仍然是温馨的。两个月前,我曾经把卡夫卡写给他父亲的信拿给母亲看。几个星期过去了,她一直什么都没说。但是这会儿,在电车里,她突然说:那个叫卡夫卡的年轻人写的都是真的,字字句句都真。接着,她谈起了自己的父亲、兄弟,最后还谈到了丈夫。絮叨之中,最入我耳的是那句“那个叫卡夫卡的年轻人”。听她说话的口气,仿佛卡夫卡没有死,我们经常和他碰面,他就住在我们一栋楼里。我们现在坐电车回家,没准儿在楼梯上就能遇上我们这位出色的邻居。我虚构了一个场景,没想到母亲竟然十分配合。

如果我们在楼梯上碰巧遇见了卡夫卡先生,你会请他吃午饭吗?

那要看他饿不饿了。母亲说。

估计会饿。我说。他在保险公司工作,收入很少。

如果给他做煎饼吃,你看他会有意见吗?

不会吧。我说。

那就做煎饼。母亲说完,笑了。

一直到2月中旬,母亲才帮我在一家运输公司找到一份商务学徒的差使。过了一个半月,在4月1日,我进入公司开始了学徒生活,每天工作时间是早8晚5,星期六是中午1点下班。我工作的部门是发货部,一个房间六个人。负责给我安排工作的是一个女同事,她姓西

本哈尔,年纪在 30 岁上下。如果电话铃响了,可能是有客户要订购电视,也有可能是要订购音响柜或冰箱。接下来你的任务是填写发货单,货物凭发货单寄给客户。货物发出后,你根据价格表上的价格,用打字机打出账单。交待工作用了大约 10 分钟的功夫,我便知道了发货部的工作流程。在这儿工作,最不舒服的要数周围始终有六个人像观众似的看着你,在他们面前要花招,我想肯定是行不通的。要说感受,倒也没有什么。天天干着自己的工作,生活在成功和失意之间。不过我一再告诫自己,眼下一时半会儿还不可能结束在发货部的工作。有的时候我的脑海里会突然闪现一个句子,于是我立即记录下来。我坐到桌边,写下:我们的境遇不是对我们人生的判决。这个句子我觉得不错。但是没过一会儿,我自己也弄不清楚这个句子算不算美,算不算真实,算不算有趣。到了晚上,我总算认识到,这句话把我从目前处境的思考分拆成了两部分。一部分是我承认了目前的现实,身陷进去便暂时不可能逃脱,另一部分是对这种不可能逃脱的状态竟然有一种沾沾自喜的感觉。在回家的路上,我感受到了内心深处那种因为思考而产生的舒畅。我甚至开始在中午休息的时候坐等新句子闪现,我专挑没有收拾过餐具的桌子,这样就不会有人打扰,但是周围嘈杂声仍然不绝于耳,一直有人在来回走动。除了我,公司还招了其他五个学徒,其中有一个是女孩子。他们端着各自的餐盘,蹑手蹑脚地绕过桌子,不敢和西本哈尔夫人或布雷迈尔先生坐在一起。可惜我和他们几个学徒工也没有什么好谈的。他们年轻,没有什么密不可宣的计划。只有一个人例外:安塞尔姆·马夸德。他差不多有 20 岁了。

他让我注意,是因为他走路时身体喜欢向后仰,而且动作有些神经质。他是唯一一个看穿了我心思的人,知道我坐在脏桌子旁是为了免遭打扰,但是他毫不理会,仍然一屁股坐在我的旁边。看着菜单上的固定套餐甲和固定套餐乙,我们两个哈哈大笑。所谓固定套餐甲通常就是一块煎肉排配土豆和色拉,固定套餐乙是蔬菜杂烩、鸡蛋色拉或扁豆汤。我们两个相互打听,问对方有没有固定的女人、固定的裤头、固定的肥皂。我现在知道了,安塞尔姆每周有两个晚上去戏剧学校上课。他至少还有两年才能完成学业。他的情况和我一样,来做学徒也是迫不得已。我们的笑声吸引了另外一个学徒工彼得·索莫林,估计他以为我们在说什么笑话。他来收拾我们的桌子,把脏盘子送回打饭的窗口。我和安塞尔姆在想是不是拦住他,但是又不想让别人觉得我们怪兮兮的,只好茫然地看着索莫林把我们的掩护一点一点地撤去。清理完毕,他坐在我们的桌子旁,看着我们,面前是他的那份固定套餐甲。索莫林不会讲笑话,只知道抱怨手上的餐刀不够快。

那段时间,我终于和一家当地的报纸建立了联系。这是一家日报,如今早已关闭了。当时怎么联系的我已经记不清楚了,因此现在描述起来比较模糊。可能是我发现了这家报纸,给编辑部看了一点我的东西,也可能是我给报纸投了稿,过了一段时间又给报纸打了电话。但是有这么五分钟,我记得非常清楚。这五分钟是这家报纸的一位编辑给我的。他是一个年轻人,脸色苍白,动作麻利,看上去很忙。我没有告诉他我是一个学徒工,他也没问。在和我谈话的时候,他时不时地用打字机打上几句话。这一点我印象特别深。他甚至没有问我以

前干没干过新闻。也许他已经看出来，我对这个行当一窍不通。就在我觉得这次面试看来没有指望的时候，他提出了一个问题。他指着我在《西木》上发表的一篇讽刺短文，问：你写这么一篇文章要多少时间？

如果知道开头和结尾怎么写，大概两个小时。

也许这个回答里面包含了关键性的东西。赫尔德根（这是这个编辑的名字）需要一个快手。过了大约三分钟，他给我安排了一个任务，具体内容是，派我以他报社的名义去参加一个活动，然后写一个短篇报道。不要多，打字机纸一张半。交稿时间是活动第二天的中午。

这次面谈后，我当上了记者，开始的时候是每周两篇稿子。我的第一个任务是写一篇有关挪威海峡幻灯报告会的文章。那个时候用幻灯的形式介绍异国风情非常受欢迎。市政大厅里挤满了人。看见有那么多人，我着实吓了一跳。在大厅的前方，紧靠着报告人讲台，是为当地媒体专设的位置。报告人特别向媒体表示了欢迎。我当时热血沸腾，一激动，记下了太多的笔记。我很清楚，不可能第二天上班的时候在运输公司的办公室写稿子，于是深夜 11 点到家后坐在厨房的桌子上打起了稿子。我听见爸爸在打鼾，妈妈在呻吟。妈妈到厨房来了一次，她身穿睡衣，喝了半杯水，吃了两片药。她冲我笑了笑，但是什么也没问。在深夜快两点的时候，稿子写完了。第二天，我利用午休的时间把稿子交给编辑部。赫尔德根看了我的稿子，考虑了片刻，又给我布置了一个任务。估计第一篇稿子是被采用了。果真，稿子第二天就见了报。敲门，仅仅五分钟就有了工作，这是一件很简单的事，